

和平发展道路：模式的突破

赵可金

新中国成立以来 的 60 年，是中国从一个置身国际体系之外的旁观者和疏离者逐步成长为一个当今世界新兴大国的 60 年。60 年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实现根本调整，中国的国际角色实现明显变更，中国的对外战略思维发生重大变化，中国越来越形成了一条有别于其他大国崛起的发展道路——和平发展道路。这是一条在全球化时代积极与世界互动互惠、合作共赢的发展道路，是一条科学发展、和平发展、和谐发展相统一的道路。

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具有深刻的政治内涵和重大的时代意义。尤其是在过去的 30 年内，中国的发展与世界全球化、信息化和谐互动，实现了中国发展与全球发展的交响，走了一条不挑战现有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和平发展道路，以创造性的实践开辟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发展模式的自主性道路。它打破了现代化只有西方道路的一元论，赋予发展模式以多样化和丰富性的内涵。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用无可辩驳的事实告诉世界：在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完全可以从自己的国情出发，通过非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途径，实现国家和社会现代化的目标。因此，和平发展道路既是对传统社会主义道路的突破，也是对传统资本主义道路的突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外部实现形式。

和平发展道路

是对传统社会主义道路的突破

和平发展道路是对传统社会主义道路的突破，是对关起门来搞社会主义和世界革命道路的突破。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以来，社会主义在苏联、东欧等国家遭遇了挫折，传统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遇到了挫折，从根本上与独立发展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斯大林模式”密切相关。斯大林模式是战争与革命时代俄国特殊条件下的产物，是在资本主义包围下，一个经济落后的大国为了生存和发展，通过在体制上实行全盘集体化，建立指令性的计划经济和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不惜一切代价加强自身经济实力和国防力量。此种模式的核心是社会主义国家将自己与资本主义世界隔绝开来，独立建设社会主义，为世界革命奠定基础。尽管此种模式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但也存在着体制僵化、资源约束和活力不足的深刻缺陷。此种模式的发展空间是有限的，一旦可利用的资源达到极限，弊端便会暴露，越是小国，问题暴露得越早，比如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就感受到这一发展模式的局限性。其实，马克思早就指出，社会主义必须在发达国家同时取得胜利，那种“地域的、封闭的共产主义”只能导致愚昧、迷信和专制。斯大林模式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开放性的基本要求，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世界社会主义的失败不是社会主义道路本身的失败，而是“斯大林模式”的失败。

相比之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之所以能够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重新复兴，而且越来越具有生命力，关键在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所采取的改革开放政策，走出了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通过改革开放，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天地得以进一步打开，充分利用全球化和新技术革命所带来的战略机遇，为中国的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其实，这里牵涉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问题，那就是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邓小平同志在谈到这一问题时，深有感触地说道：“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一个新经济政策。”关于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列宁曾经作过概括，即“资本主义 + 社会主义”，新经济政策的目的是利用资本主义来促进社会主义。很明显，列宁的意思是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嫁接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母体之上，并学会从资本主义肌体上获得营养，来促进社会主义因素从襁褓中慢慢发育成熟，瓜熟蒂落。改革开放

以来中国的实践，显然与列宁的思路是吻合的。

3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证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作为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与资本主义世界对接在一起，坚持走开放的和平发展道路，通过开放谋求合作，通过合作促进发展，在共同利益基础上，与世界各国实现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唯有如此，落后国家才能具备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支点，才能从根本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因此，在广泛参与国际分工体系中壮大中国社会主义的力量，在向世界开放中获取“资本主义肌体”的营养，在与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合作共处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这就是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精髓，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核心。

和平发展道路

是对资本主义道路的超越

和平发展道路不仅是对封闭的和革命的传统社会主义道路的突破，也是对对外扩张和转嫁危机的传统资本主义道路的突破，它不是一条争霸道路和战争道路，而是致力于世界和平和世界和谐的道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由全球化的时代特点、中国发展的内在需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任务共同决定的。

自从15世纪以来，世界资本主义大国的道路都不是和平发展的道路，而是一条海外殖民、对外掠夺、扩张乃至发动侵略战争的道路。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国际竞争越来越让位于综合国力的竞争，让位于营造和平国际环境，围绕技术、人才、资源等生产要素而展开日益激烈的核心竞争力的角逐而非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争论。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竞争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竞争力，主要来自于通过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为中国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市场、资本、技术、人才、资源等要素，增强社会对国家的认同；来自于积极参与制定和改善国际规则、国际规范，维护公正、和平、稳定的国际新秩序，与世界各国共同致力于建设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提高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与号召力。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截然不同于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大国所走过的现代化道路，它是科学发展、和平发展和和谐发展的统一，基本理念是和平、开放、合作、和谐、共赢，将自己的发展建立在与不同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发展模式多样自主、文明成果交流共享的理念基础上，从而实现与整个世界的共同和平，共同发展，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根本的理念。

同时，中国选择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也是全球化时代的不二选择。全球化的发展已经将中国和世界密切联系在一起，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在对外贸易、国际投资、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的对外依存度都在上升，中国选择非和平发展的成本和代价都已经异常高昂。因此，中国不可能像历史上的德国、日本那样采取不惜一切实施对外战争和扩张的方式积累资源，因为在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对世界发展环境的破坏同样也会对中国自身产生消极影响，甚至导致中国综合国力和社会发展程度的倒退。在全球化时代，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也再不是“谁胜谁负，你死我活”的关系，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关系，是“竞争中合作，合作中竞争”的关系。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不是消灭资本主义或者取代资本主义，而是如何有效利用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发展服务。

事实上，国际社会最担心的并不是未来中国与他们在军事上摊牌，西方国家联合起来足以应付中国一个国家的挑战，他们最担心的恐怕还是中国通过不懈努力，快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一旦这一目标理想成为现实，中国的实践就将雄辩地证明，人类历史并非只有资本主义一途，一个国家完全可以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最终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的历史使命。如此一来，“历史终结”的预言将宣告彻底失灵，国际力量对比将发生有利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变化，这是对资本主义世界最具杀伤力的武器，也是资本主义国家所不愿意看到的。

和平发展道路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由之路

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由之路，这是由中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所决定的。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实践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才能解决 12 亿人口共同富裕的根本问题。但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并不是马克思所设想的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成长出来的社会主义，而是在最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通过革命产生的社会主义，在中国搞社会主义不能摆脱中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在发展问题上，中国比其他国家面临着更大的压力和更严峻的挑战，不能回避资源相对短缺的压力和人口超大规模社会的压力。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建设中国社会主义必须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力，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在 1992 年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强调：“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奋斗，绝不能掉以轻心。”只要中国贫穷落后的社会面貌没有根本改变，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就一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头等大事，动摇不得。要耐得住寂寞，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无论其他国家怎样评论，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那种小富即满、稍有发展便骄傲浮躁的情绪都是要不得的，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宗旨相背离的倾向。

在世界范围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还受制于资本主义长期居于优势地位的国际体系的限制，决定了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尤其是 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反而是资本主义表现出相当强劲的发展活力，出现了全球化浪潮，出现了日新月异的科技革命和以信息网络为基础的“知识经济”，创造了新的更高的社会生产力，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力量对比在世界范围内进一步失衡。面临此种失衡的国际社会格局，中国单枪匹马地挑战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是没有出路的。中国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完全取决于中国自身的发展，取决于中国经济实力和社会局面的改善。我们只有利用各种机遇，集中精力搞好国内建设，把中国发展起来，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我们在国际事务中才有发言权，也才能证明社会主义优越性。诚如邓小平所说：“到下个世纪五十年，如果我们基本上实现现代化，也就可以进一步断言社会主义成功。”我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不是在战场上论英雄，而是在发展道路上比实力，在发展前途上比后劲。中国不必追求在军事上战胜对手，不必诉诸谋求霸权，也不必过分刻意关注所谓的世界影响力，只要中国充分利用国际和平环境的“战略机遇期”，将自身真正发展壮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自然就体现出来。近年来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热烈讨论，关于“中国模式”的推崇，对中国实力的关注，归根到底都是由中国 30 年来持续、快速的和平发展实践所决定的。认识到这一点，对理解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意义至关重要。

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只有选择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才能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和平发展道路设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图：在国外，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尽可能地建立各种层次的合作关系，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赢得时间、资源和机会；在国内，积极推进市场经济进程，发展多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最大限度地释放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发展生产力的积极性，为社会主义发展壮大提供坚实基础。因此，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外部实现形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和平发展道路的本质特征，两者是同一条道路的不同实现形式，在实践中，两者互为表里，相互支撑，共同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事业。